

扬州地方文献丛刊

# 广陵思古编

GUANG LING SI GU BIAN

清·汪廷儒 编纂

田丰 点校

广陵书社

扬州地方文献丛刊

# 广陵思古编

GUANG LING SI GU BIAN

清·汪廷儒 编纂

田丰 点校

广陵书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广陵思古编 / (清) 汪廷儒编纂 ; 田丰点校. -- 扬州 : 广陵书社, 2011. 12

(扬州地方文献丛刊)

ISBN 978-7-80694-796-8

I. ①广… II. ①汪… ②田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古典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4512号

书 名 广陵思古编

编 纂 (清)汪廷儒

点 校 田 丰

责任编辑 王志娟

出 版 人 曾学文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

邮编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

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416 千字

印 张 29.5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94-796-8

定 价 85.00 元

(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## 整理说明

《广陵思古编》是清初至道光年间扬州学者、作家所作古文的一部总集。

辑纂者汪廷儒,生于嘉庆九年(1804),卒于咸丰二年(1852),字醇卿,又字莼青。扬州府仪征县人。其父汪绅,字笏庭。幼孤贫,靠亲戚资助而成家立业。这种经历使他养成乐于助人的美德,对贫苦的亲友“竭力助之无所吝,乡里称长者”<sup>1</sup>。汪廷儒早年远比父辈幸运,宽裕的家境使他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,奠定他日后成就学业、进入仕途的基础。道光二十年(1840)中举,二十四年(1844)成进士,以长于文学、书法得任翰林院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。二十六年(1846)任江西乡试同考官,咸丰元年(1851)任恩科顺天乡试同考官,选拔得人,为士林称赞。次年,病故于京城寓所。

汪廷儒在嘉庆道光年间以学行优异而跻身扬州名儒之列。《同治续纂扬州府志》卷九《人物》有他的传记,表彰其“友爱笃行”、注重乡邦教化的事迹。撰有《思古随笔》、《知菜根味诗集》、《延月轩古文抄》,惜已亡佚。他在书法、绘画方面造诣深湛,有部分作品传世。

据汪廷儒的姻亲金长福追记,《广陵思古编》的辑纂持续30年之久。照此算来,汪廷儒早在20岁左右即着手搜辑乡邦文士的文章。究其发此宏愿的缘由,大致有四:其一,自身学习的需要。扬州文学之盛海内共传。他当时正处于习文、应举的人生阶段,搜集、钻研本地名家之作,无疑有益于增进学养,提升创作能力。扬州士子历年应试积累的不少精彩篇章,对于他学为制艺,不失为范例。其二,保存乡邦文学文献。他在《广陵思古编·自序》中说,近世本郡文士之作,“若子孙守缺而未梓,文士罕见而传抄,板片侵亡,遗逸过半者又复不少”。在他看来,编纂《广陵思古

---

1 方濬颐等纂《同治续纂扬州府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第42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834页。



编》具有抢救文献的意义。书中辑存不少失意寒士的作品,使之人、文俱传,也不失为扶助他人的一种善举。其三,展示乡邦文化优势。在此之前,前辈学者整理近世乡邦文学文献已经取得显著成就。嘉庆三年(1798),阮元(1764—1849)编定《淮海英灵集》22卷,刻于小琅嬛仙馆。嘉庆六年(1801),又撰《广陵诗事》,刻于浙江节署。嘉庆二十年(1815),焦循(1763—1820)根据伊秉绶、阮元提议,并在伊秉绶资助下辑成《扬州足征录》27卷,存录有关扬州史事之文300篇。凡此,对汪廷儒都有引导作用。其四,以文章经世的需要。他对散落未刊之文,“关风俗盛衰,系政治利弊,以及水经、人物、书籍考证诸作,凡有见者,辄皆掇录”。其思想境界,显然超越猎名意识和乡曲之私。因此,他能矢志不渝地辑刻众家之文,给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《广陵思古编》成书过程可据作者自序及各家序考定。刘文淇(1789—1854)道光二十三年(1843)《序》记载,他曾以《广陵思古编》代为呈请阮元指正。阮元“细加翻阅,深嘉醇卿之志,谓当更加搜辑,以成巨观”。据周叙《序》,《广陵思古编》有初刻本,即阮元所见本。周叙所谓“初刻太略”,可与阮元的意见相印证。汪廷儒的姻亲、同郡金长福所撰《序》谓廷儒“积三十载以程功,开五百篇之巨制”,大致反映出汪廷儒“更加搜辑”的成效。汪廷儒《自序》及金长福《序》均撰于道光三十年(1850),此为29卷增补本编定、刻成之年。

《广陵思古编》所收扬州府属各州县之文士及作品之数(以正题为准)如下:卷一至卷十,江都县49人,158篇;卷十一至卷十二,甘泉县17人,28篇;卷十三至卷十五,仪征县22人,49篇;卷十六至卷二十,高邮州25人,56篇;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,兴化县27人,58篇;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,宝应县16人,47篇;卷二十九,泰州5人,17篇。总计辑存161家413篇文章。需要说明的是,汪廷儒辑录泰州文士及其作品最少,并非其地文坛寂寞,而是因为之前泰州学者夏荃已经辑纂《海陵文征》20卷,其子于道光二十三年刻印成书。《广陵思古编》各卷编次大体以作者年辈先后为依据。但是卷与卷之间则不尽然。例如,卷五已辑纂乾隆年间学者,卷六则又有康熙年间学人之文。这应当是“随抄随刊”、陆续增补所致。其篇目不足金长福所谓五百之数,疑因汪廷儒对所收集到的作品有所删汰。

汪廷儒原计划以所辑古文为《内篇》、以时文为《外编》。道光《重修仪征县志》卷45载,汪廷儒已经辑得顺治以至道光扬籍士人制艺284篇。大约随着汪廷儒辞世,《外编》未能付梓。汪廷儒在编定《广陵思古编》之后,还曾有选辑各家文集之精粹纂为《二编》之想<sup>1</sup>,后来未曾付诸实施。

《广陵思古编》与阮元辑纂的《淮海英灵集》以及《广陵诗事》,可以说是姊妹篇。这部书与阮元所纂两书,辑刻的时间相去不足30年。在此期间,清王朝国势急转直下。1840年鸦片战争以屈辱媾和而暂时收场,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落后;道咸之交太平军揭竿而起,清王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。政治形势的剧变,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。其突出表现,一是经世思潮的涌动,二是经学领域的基本格局从汉宋争讼一变而为汉宋兼容。凡此,对《广陵思古编》的辑纂势必产生重大影响。展读《淮海英灵集》、《广陵诗事》,令人感动的是节臣、孝子、名儒、才士、畸人、列女的嘉言懿行;至于《广陵思古编》,名儒名臣的经世伟略、志士烈女的高风亮节愈加动人心魄,而沉郁激楚的“思古”基调尤其与阮辑二书重在揄扬“淮海英灵”有所区别。

汪廷儒说,《广陵思古编》收录是近世乡邦文士的作品,之所以题为“思古”,意即“思古人”。本编收录作品,限于作者业已辞世,所谓“文章,身后始定”。则所谓“古人”指已作古者。还有一层涵义,当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所谓“述往事,思来者”,即以前人之事为来者之师。故其辑纂文章的主旨是经世致用。其突出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:

其一,革除弊政。顺治、康熙年间,清王朝扭转明末战乱相寻、民生凋敝的局面,逐步走上稳定、发展的轨道。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是没有弊政,重要的是诸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。《广陵思古编》收录的若干文章表明,扬州士大夫当日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。如,李宗孔《请停守令丁忧题留疏》,针对郡县守令值丁忧而追求夺情留任的现象,揭露其贪恋禄位的居心、背德忘义的本质以及上下勾结、工于营私的行径,主张厉行禁止。他的《请革风米收兑之弊疏》,是一篇反对劳民伤财的好文章。清承明制,江南庐、凤、淮、扬四府州县,先以大米西运,缴送风阳;而后再从风阳东输,分配给扬州、狼山各营官兵。如此荒谬的制度得以延续,且并不罕见,是由于“上下衙门恋恋于陋规,使费而不能舍”。他主张就近征收、就近发放,

1 见《广陵思古编》之《凡例》及卷七汪中《上宝应吴郎陵明府书》作者附传。



并把这一做法推广开来。又如,许承宣《请禁额外赋税疏》以扬州府为例,痛陈“赋外之赋”、“差外之差”、“关外之关”、“税外之税”给平民、商人带来的沉重负担。其文云:“顺治二年奉旨,凡民间米麦税课,概行禁革。今则农船小艇,一米一豆,莫不征税。甚至乡民骡背肩挑,不免悉索。又有货本无多,而所税之数反过其本数倍,至愿弃其货以逃而不可得,此甚可悯也!”当时地方政府制定的赋税法规,危害之烈一至于此。李宗孔毅然为民请命,其精神难能可贵。他如郑为光《请清厘关蠹疏》,王永吉《节用爱人疏》、《核饷清兵疏》,王念孙《剿贼疏》,夏之芳《请严积弊疏》,李桢《论会议疏》,程盛修《请慎重简用知府疏》,撰著年代不尽同,也都是切中时弊、有裨国政的佳作。

其二,崇尚实学。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清代关系政治、经济全局的大事,而淮扬水利工程则是重中之重。淮扬地区的社会发展既得力于江、淮和大运河,也长期为多发的水灾所困扰。故学者多重视研究水利工程。道光十八年(1838),刘文淇钩贯史籍,著《扬州水道记》。汪廷儒作为刘文淇的朋友,对此必有知闻。他辑纂《广陵思古编》,关于治水文章收录特多。如许承宣《浚渠塘以备旱潦疏》、《西北水利议》,徐寅亮《请办高堰碎石坦坡疏》,王永吉《亟陈水利要害议》、《重浚射阳湖议》、《与南河工部疏》,王明德《敬筹淮扬水患疏》,王安国《奏疏浚海口疏》,李桢《治河议》,朱泽沅《由济宁至汶河卫河记》、《治河策》上下篇,杨景涟《徙河论》、《分淮论》,刘台斗《黄河南趋议》,宫梦仁《请专河工责成疏》,多以实测地理形势、纵观历年水患与治水得失为基础,提出有关对策。这种以究明郡国利病为己任的学术精神,值得后人学习。嘉庆、道光年间,外患日益紧迫。于是有识之士高度关注国家安全,尤其关注周边局势。这在《广陵思古编》的选文上也有所体现。关于西北边疆的有徐寅亮《西宁备番疏》,关于南疆的有管宏进《拟赐安南国王诏》、潘遇莘《拟赐安南国王诏》、泰州沈默《拟赐安南国王诏》,关于东部海疆的有汪楫《中山沿革自序》。这些文章相对于扬州学者研究边疆问题的成果而言,只是很小的部分。但汪廷儒选录这类文章,还是可以体认他的爱国情怀。

其三,维系世风。清廷长期奉行暴虐的专制主义,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。与汪廷儒同时期的思想家、文学家龚自珍(1792—1841)在《古史钩沉论》中痛斥君主专制及其危害,说:“未尝不仇天下之士,去人之廉,以

快号令；去人之耻，以嵩高其身。一人为刚，万夫为柔，以为大便其有力强武”；“大都郁积百年之力，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，既殄，既猕，既夷，顾乃席虎视之余荫，一旦责有气于臣，不亦莫乎”<sup>1</sup>。嘉道时期士风不竞，龚自珍在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》、《平均篇》中感慨系之，兹不赘引。汪廷儒则以乡贤刚直之品激励士气。他在《还是读书堂课艺序》作者《附传》中记载李道南这样一则轶事：道南“中乾隆三十六年进士，归班返里，同人饷五百金，不受。谒刘文正公，文正偶欠伸，李揖求退。文正诘之，李曰：‘礼有之，君子欠伸，侍坐者请退。’故未言而去。文正以是重之，书张横渠‘学颜子之学，志伊尹之志’二语赠之。”此“刘文正”即内阁大学士刘统勋（1699—1773）。李道南以官场新人而晋谒这位朝廷重臣，能够如此不卑不亢，殊为难得。汪廷儒所作“附传”，一般文字简短。于此记述较详，足见他钦佩李道南之为。《广陵思古编》选文，很留意择取针砭世风的作品。宗元豫身历易代之变，对于世风浇薄具有切肤之痛。他在《与冷又湄书》中喟叹：“夫傲于自处而责人谦，薄于自处而望人厚，此流俗通病，诚不足责”；“嗟乎！云雨反覆，变于俄顷，炎凉向背，征于旦夕。以至片言相忤，一事偶失，操入室之戈，下陷阱之石者，比肩接踵于世。行之者自谓得计，见之者不以为非。人而沦于异类，久矣。”这是他对“乱世末流”的写真。汪廷儒存录本篇，想必深有同感。他对记叙忠臣、孝子、烈女的作品收录甚富，反映出特定的价值取向。宗元豫《答李映碧廷尉书》：“忠孝一理，夫为人臣而遭国变，或殉封疆，或死职守，或遁于荒野。耻事二姓，非古人之成法乎？今有人臣，能则效之，或死或遁，期于自靖自献，亦庶几无负臣职矣。有谓之好名者，世必以为邪论，必以为党失身异代之人也。何独至于人子则不然？夫使为人臣子者，皆好忠孝之名，皆以不忠不孝为耻，而乱臣贼子不接踵于世矣。”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汪廷儒思想的参照。

其四，改良学风。乾嘉两朝朴学崛起，扬学继吴、皖之学而成为重镇。论学是扬州作家古文创作的习见题材。《广陵思古编》中择取这类作品颇多。其独到的眼光，不是肯定乾嘉扬州朴学名家的成就，而是注意到扬州朴学兴盛的本土渊源。近世学者论扬学渊源，往往强调吴、皖之学，尤其是惠、戴之学的影响，这自然是有根据的。可是，天下学者均可习读惠、戴之书，何以扬州学者治朴学最为积极且呈后来居上之势呢？这就需要从

1 龚自珍著《龚自珍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20页。



扬州本地的学术传统中寻找原因。宗元豫(1624—1696)《与何雍南论史书》说:

今士鲜实学,日趋浮薄,六经、廿一史、两《鉴》屏弃不观,仅剽窃诗辞,博虚名。自汉魏而下,六季、三唐、南北宋诗词亦屏弃不观,仅阅一二选本,或掇拾类书,沾沾自喜,谓诗人博物如是而已。由一二虚名之人倡之,富贵子弟及市井末技附会其间,借诗词以文鄙俗。其人其事本不足道,第此风气以倡,后来才俊少年渐染其习,空疏野战,以为名家作者,我已饶为,无俟终年孜孜钻研故纸为也。驱天下目不识丁,必自此始。其源甚微,其害甚大。吾辈辱在泥涂,无由挽回,惟当课督子弟,劝诱里闾,穷经读史,孜孜实学。实学胜,邪说庶少熄乎!

宗元豫生活在明清之交,当时已经要求士子精研经史之学。这对于本地后学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。汪廷儒存录宗元豫此文,客观上具有揭示扬州学派本土渊源的意义。乾嘉时期,针对朴学大兴的局面,扬州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。程晋芳精研传注之学,但是最为推崇的还是理学。其《正学论》四篇,流传甚广,兹不赘述。他在当时不乏同调。李道南《四书讲义集说自序》认为:“先儒谓《四子书》为《五经》之阶梯,圣贤传心之语,莫要于此。每见学者于他经一名一物之细,经年考究,自矜博雅,而《四子书》反置之不讲,遗本逐末,其无得于义理之精也久矣”;“六经之精微,尽于四子之书,而四子之精微,尽发于朱子之《大全》、《或问》、《语类》。末学骄语汉、唐,遂欲驾马、郑诸公于朱子之上,此艾东乡所谓‘奉宋儒之弃馀,好名而无实’者也”。还有学者提出兼综汉宋的主张。李邕《拟重刻十三经注疏序》云:“夫圣人之经,一而已。而治经之途径则二,有汉唐以来治经之学,有宋以来治经之学。汉唐之学,章句也。宋儒之学,理解也。章句之谓,即‘多学而识’之谓,今行世之《十三经注疏》是。理解之谓,即‘一以贯之’之谓,今天下所宗程朱之传注是。窃尝衡而论之,二者固缺一不可。从事于章句,其学博以实,出而应天下事,能多识前言往行及名物制度之义,而为名卿材大夫以效国家之用。至究其学之流弊,则如韩子‘三品’之说、李翱《复性》之书、苏文忠《诚明》之论,见理不真,有毫厘千里之差。从事于理解,其学大以精,出而应天下事,心术正、人品端,遗大投艰,一准于理,而不致有邪说诬民以充塞仁义。至究其学之流弊,则在用之以作八股,剿袭相师,而以穷经为迂,谬妄相夸,而以学古为毒”;“然则今日而欲端所学,

计惟有用理解,以明道复性为主;用章句,以博闻强记为辅。详说于注疏之章句,而反约于周、程、张、朱之理解,庶几乎参互考订,本末具举,而为儒者大备之学也”。这可以说是明确主张会通汉宋,考据与义理相济。汪廷儒辑录论学之作,兼取汉学与宋学两家之言,透露出他本人追随汉宋兼容学术新潮的动向。

集中展示扬州文人学士古文创作成就与文学思想,也是汪廷儒辑纂《广陵思古编》的重要目标。他在《自序》中指出,自古以来扬州文化“沾被天下”,“词章”是一个重要方面,而本朝以诗词文艺“卓然成家”者亦复不少。《广陵思古编》所择取的,无疑都是他所欣赏的佳作。该书所辑以古文为限,但是也可谓体裁富赡,有诏、表、奏疏、碑、传、铭、序、跋、论、记、书信、对、赋、七、连珠等等。其中“序”独多,有130余篇。这些序,又以诗集序为大宗。这种情况,一方面是清代扬州诗歌创作特别繁荣所致,另一方面也表明汪廷儒对诗歌艺术的酷爱。从古文创作艺术的视角看,汪廷儒选文在义理方面是以儒学为宗,兼取道、释之学;在技法方面主张百花齐放,不拘一格。清代扬州文坛名家辈出、佳制如林。《广陵思古编》辑录的篇章其实很有限,但是汪廷儒格外重视择取能够反映作家文学思想的文章,这就使得这部书对于研究清代扬州文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汪廷儒在李道南《志存集序》后,附录李氏《论文》、《国朝诸家文评》、《论作时文》,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展现李氏的见解,表明他对文学思想研究的重视。

本书的校点,以道光扬州仪征汪氏藏板刻印本为底本。此次整理,尽量保持原本的体例,同时也作出必要的调整。需要说明的事项,首先是重新编制目录。原刻的目录编排体式是:(1)书前有《广陵思古编总目》,标列作者区域分布。其文如下:“卷一至卷十,江都县人;卷十一至卷十二,甘泉县人;卷十三至卷十五,仪征县人;卷十六至卷二十,高邮州人;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,兴化县人;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,宝应县人;卷二十九,泰州人(流寓附)”。(2)各卷首列所收篇目,题下标明作者籍贯、姓名及字;同一作者之文,仅于首篇之下标明,以下从略。(3)正文题下,均记作者籍贯、姓名及字,部分篇章题下注明写作年份或选文来源。今所作调整为,全书统一编制目录。因作者区域分布一览可知,原有《总目》从略,汇集分卷目录前置,并标明各卷作者籍贯。各篇正文题下所注撰文年份、选文出处,所记作者籍贯、姓名及字,新编《目录》均依正文登录。这样



处理,虽微为繁琐,却可使目录与正文保持一致,且便于读者查检。其次,部分篇目,汪氏有按语,或标“廷儒按”,或标“儒按”,或不标其名,均一仍旧观。其三,篇末所附作者小传,或有目无文,今保留“附传”二字。其四,对于避讳字,径改,不出校记。

本书的校点,承蒙广陵书社曾学文先生、王志娟女士等精心审阅,匡我不逮,谨此深致谢意! 本人涉学日浅,整理工作中不免存在疏误,切盼方家不吝赐教。

点校者 田丰

2011年12月20日

序 一<sup>1</sup>

吾友留心于乡邦文献者，于淮安得丁君俭卿，宝应得刘君楚桢，泰州得夏君退庵。三君于其乡先辈轶事遗文、残编断简，搜罗宏富，积三十年之力以成书。楚桢所采辑者，有《宝应图经》若干卷，俭卿辑《山阳诗征》二十四卷，退庵辑《海陵文征》二十卷、《诗征》十六卷。俭卿、楚桢之书成而未刻。退庵已归道山，其哲嗣先刻其《文征》，余既为之序矣。今同邑汪君醇卿以《广陵思古编》见示，属为之序，此余所欲为而未暇为者也。犹忆邵伯扬学博刻《娄东杂著》，阮相国为之序云：“昔年撰《淮海英灵集》时，但求之于诗，而未求之于文。彼时若续用力于各邑各家之遗编故帙，选择而成一书，则故家遗俗，嘉言善行，必斐然可观，惜只力于诗，仅以其余力为《广陵诗事》数卷而已。”盖深歎广陵遗文之未编也。适相国来馆中，余以醇卿此编代为就正，相国细加翻阅，深嘉醇卿之志，谓当更加搜辑，以成巨观。因即述余向所倾倒于三君者，并今相国之言，以识简末。

道光癸卯十二月朔，同里弟刘文淇撰。

1 标题为校点者所加。



## 序 二<sup>1</sup>

曩仪征太傅撰《淮海英灵集》，一时通显、隐逸之士，诗词歌咏，搜葺无遗，阐显幽微，厥功匪浅，犹未及于遗文也。夫发而为文，足以考证文献，阐明义理，关乎天下国家、名物之故为尤多，不必皆达而在上。其达者，多刻有专集，然或后裔不振，未及衰成；至瓠落厄穷之士，随手散弃者多矣。同乡汪君醇卿瞿然念之，于道光癸卯葺《广陵思古编》，分为内、外，《外编》皆时艺，《内编》则古文。以初刻太略，辗转续补，厘为廿九卷，而犹若有恨也。

嗟乎！文字日出而不穷，一人之耳目为有限。第即现在闻见、愿力之所能及，竭诚而为之；其未及为者，即听之后人，则亦何恨乎缺漏哉！独怪汪君已置身瀛馆，赞襄黼黻，疑有不暇为此者，而急于同乡之谊，虑老成故旧、嘉言善行湮没无存，其忠厚悱惻为何如？宜乎太傅于初刻深嘉其用心，更勉以续成巨观。今巨观已成，而太傅不及再见，则又不无泰山梁木之感矣！

乡愚弟周叙拜序。

---

1 标题为校点者所加。

序 三<sup>1</sup>

夫挚虞撰《论》，树萧《选》之先声；姚铉类编，补《英华》之佚简；东莱创为《文鉴》，西山标以《正宗》。代有成书，毋劳举例。金、元以降，体制攸殊，繁简相县，醇驳互见。综其流弊，厥端有二：

盖文章之总集，即史氏之外编。或才著鸿通而行多瑕纇，或名登孝秀而词伤茶疲。欲探微而阐幽，务研表而核里，假使名实未副，始终倏渝，纵声音之克彪，必清华之有玷。此以人存文之弊，一也。

又或兼采时流，并收臞作，弃取鲜当，甄录弗精，荃艾同升，珠砾竞进，未能别裁伪体，沙汰芜词，习世态之周旋，拾儒流之糟粕，空有惭于作者，知无与于当家。此以文存人之弊，二也。

吾姻醇卿先生，慧性通明，天才绮练，学誉麟角，胸藏凤毛。萱方茂于北堂，藜早燃于东观。承明珥笔，大雅扶轮。虽射策之年未逾强仕，而著书之乐勿间寝兴。爰是略古论今，征文考献。以广陵一郡，绵延楚、越，襟带荆、吴，士马极其精妍，鱼盐述其繁富。淮东、江北，千里波澄；婺女、牵牛，三霄采溢。所以蔚为杞梓，望比鸾龙，通材大儒，名臣耆宿，远则增光史乘，近亦垂芳家牒。人皆百世之英，家成一品之集，久登剞劂，咸入搜罗。又如委巷贫儒，单门下士，青毡半敝，黔突无烟，耻怀刺以相干，挥遗金而不顾。读庾信伤心之赋，白首酸辛；咏陶潜负米之诗，萧辰凄恻。甚至故山薤骨，宿草生磷；旧屋为墟，楹书覆瓿。恸遗篇之废坠，墨渖空留；惜断楮之飘零，泪痕犹渍。先生卢仝食朽，劓缉丛残，既荟萃夫群言，复皋牢其杰作。或询诸朝籍，或访诸故家；或叩之藐孤，或商之逸老。以至名园片石，拊摭无遗；萧寺经龛，纂搜殆遍。秘笈尽归掌录，宏编悉付手民。积三十载以程功，开五百篇之巨制。沥青未燥，研露长濡，琴胶百衲而文斑，鲐合五侯而味错。综诸贤之宿构，成一郡之完书。锦罽装池，早辟羽陵之蠹；琳编戢香，常窥宛委之珍。从此津逮英髦，韵流册府，永焕三江之色，近补《四

1 标题为校点者所加。



库》之藏。又何待餽褭奇文，翻宝书于福地；釶覘新语，征嘉话于谟觴也哉！

道光岁阳在庚月阳在戊，姻愚弟同郡金长福雪舫撰。

## 自序

广陵居江海之中,应斗牛之次,人文蔚焕,代不绝书。李善注《文选》,二徐注《说文》,词章、小学,沾被天下,厥功伟哉!宋、明来,凡扬人著作采入《四库》者不下数十种。至国朝而大盛,不特仪征阮氏、甘泉焦氏、高邮王氏说经诸书津逮后人已也。近来各家文集,板可充栋;若子孙守缺而未梓,文士罕见而传钞,板片侵亡,遗逸过半者又复不少。其中关风俗盛衰,系政治利弊,以及水经、人物、书籍考证诸作,凡有见者,辄皆掇录。惟已刊专集,当世通行者,姑置之。名曰《思古》。“思古”者,思古人也。说者谓一人所见,阙略必多;一人私钞,去取必舛。夫一斑非全豹也,而不能谓一斑之非豹。前有遗者,后补之;后有作者,续增之,区区志也。吾乡专集之文,其盛如彼;散见之文,其盛如此。此外,经史疏证、诗词、小学卓然成家,不能节取者,复指不胜屈。江苏八郡,安在人文坛坫不首重广陵哉!至谓道德为先,文艺为后,则诸君子德行、政事照耀人寰,又卓卓有志乘在。

道光二十九年仲秋,仪征汪廷儒谨序于京师之愿闻过斋。



## 凡 例

兹编分《古文》、《时文》两册，皆郡人遗作。凡未刻稿者，录登数首，附以小传，犹王文简公《感旧集》、阮相国《淮海英灵集》之例。若其人尚存，概不敢录。文章，身后始定，昭明《文选》所以不收何逊也。

同乡文有专集者，容择录精篇，以归二集。

是编仅就廷儒所见钞录。悦同乡君子传家有集，志切诵芬；或代访遗编，均求惠稿录钞。其原稿约期缴还，不至遗失。

兹编随钞随刊，但于每卷中，约分时代先后。

兹编近取同乡，若久作寓公，身后无专稿者，亦附。